

前 言

朝鲜与中国接壤 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从遥远的古代开始 朝中两国就结成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友好往来不断，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数千年来，朝鲜半岛上的古代国家与中国大陆同时代的封建政权之间，不管两国的历代王朝如何更迭 都不曾改变彼此间的联系 两国政府及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十分频繁 从而使两国间的各种关系得到不断加强。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于 1392 年建立后 积极推行同中国明皇朝 1368 年建立 的睦邻交往政策 与明朝保持了长达二百余年的传统友好关系。特别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2 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的抗倭战争中 朝鲜军队与明军联合作战 制止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李氏朝鲜成为明皇朝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而正是以朝鲜王朝对明皇朝朝贡关系为基础，构成了当时朝中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

在与中国明皇朝进行交往的同时，朝鲜王朝还注意与其地理位置接壤的中国东北边疆民族的交往。这其中，朝鲜王朝与中国满族之前身——女真族的关系，成为彼时期朝中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朝中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女真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很早以前就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自辽朝时期女真族正式形成之后 朝鲜的高丽政权便与辽、金、宋、元王朝内部的女真部落之间 有了诸多友好交往和矛盾冲突。到了李朝前期 为了顺利推行北拓政策，当时的朝鲜统治者更注重发展与明朝北方边疆民族女真族的关系 尤其是对建州部女真 不断实施驱逐、镇压以及同化措施 恩威兼施 打拉并举。

明代的女真 分布范围很广 据《大明一统志·女真传》记载：“女

真 东濒海 西接兀良哈 南邻朝鲜 北至奴儿干、北海”。明朝时期 按照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以及地区分布 女真族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其下各有若干大小不等的部落。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为“野人女真”（或称东海女真）居住在开元（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古城）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的称“海西女真”而遍居于长白山北部图们江、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则为“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中国女真族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群体，同时它也代表了女真族发展的大方向 正是它后来取代了腐朽的明王朝 建立起了统治时间达二百七十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

当时朝鲜当局对待明朝北方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采取的是怀柔与打击的两手政策，而这一点与明朝统治者对待建州女真的态度有同有异，因而在如何对待建州女真问题上，朝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颇为复杂的局面。由此看来，着重探讨一下朝鲜王朝同建州女真关系的来龙去脉及其本质内容和历史规律，对深入了解明朝时期的朝中关系很有必要。

因朝鲜与建州女真人地壤毗邻 在建州女真发展初期 朝鲜王朝一度曾利用此特殊的地理条件，同明皇朝争夺对女真的统治权。而正是由于疆土相连 朝鲜与建州女真之间发生了一些边界冲突 即朝鲜曾兴师侵入建州，建州女真也曾派兵寇犯朝鲜。及至建州女真建立起后金割据政权与明皇朝公开决裂 传统的朝中政治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 原本以汉族政权为主流同朝鲜的关系，进而演变成以女真族政权为主流同朝鲜王朝的关系。从朝鲜外交政策而言 其与建州女真民族政权、明皇朝构成了三角外交关系。这其中，朝鲜王朝扮演了重要的中间角色，在东北亚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它灵活地处理与上国明皇朝及新兴势力后金之间的政治关系，达到了在夹缝中生存的目的。朝鲜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颇引人注目。

从建州女真方面而言，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当初期羽翼未丰时，是顺事朝鲜王朝 向朝鲜纳贡 请求授职 积极发展同朝鲜的友好关系，以图建州女真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而当建州女真建立后金政权同明朝公开决裂之后 先是极力拉拢朝鲜 以消除女真人在与明朝分庭抗礼之

斗争中的后顾之忧 继之发动对作为明朝附属国朝鲜的战争 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 先结为“兄弟关系” 继之使朝鲜臣服 成为自己的藩属国。建州女真在弱小与强盛时期 对朝鲜所采取不同政策的做法 也值得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进而可以揭示出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朝鲜王朝与明朝时期建州女真的关系，是朝中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因而历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以下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加以述评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于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国内史学界的诸多著作曾经作了或多或少、或简或繁的论述。孙进己、张璇如等的《女真史》是一部较全面地介绍女真民族起源、发展过程历史的著作，其中对我国辽、元代的女真与朝鲜半岛上同时代的高丽之间的关系 概括地予以说明 但对于明代女真与李朝的关系 却未涉及到。在董万仑的《东北史纲要》、佟冬等的《中国东北通史》这些东北地方史著作中 女真族作为中国东北边疆的重要民族之一，自然被列入东北历史的阐述内容；并且，书中提到了朝鲜历史上的各个王权与其邻境的女真（包括明代建州女真），开展经济贸易以及边界冲突的一些史实。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撰写的《中朝关系通史》 蒋非非、王小甫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姜龙范、刘子敏的《明代中朝关系史》等 属于中朝（韩）关系史著作 主要探讨的是各时期中朝双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但由于女真地理位置正处于中朝边境，女真与朝鲜关系的发展是彼时中朝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在两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而这些关系史著作都设有专节 来介绍高丽与女真、李朝同女真 包括明代建州女真的各种友好关系和矛盾冲突。这其中 由于姜龙范、刘子敏的《明代中朝关系史》属断代史著作，故对朝鲜与女真关系内容的阐述更为详细些。

但这些著作的特点是 或者只限于叙述女真的发展史 或者泛泛地介绍女真与朝鲜的一些交往史实 停留于史实的平铺直叙 而对朝鲜与后来建立满清王朝的建州女真之间一些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探讨力度尚嫌不足 未能达到就相关内容展开具体论述 且少有从理论的高度进

行某些专题研究。

论文方面，国内亦有一些相关成果出现。代表性的论文有李善洪的《猛哥帖木儿与朝鲜的关系》论述了满族肇祖猛哥帖木儿从顺事朝鲜到游离于明廷与朝鲜之间的问题。王兆兰的《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朝鲜两次入侵建州》介绍的是1433年和1437年朝鲜前后两次征伐李满住建州卫之事。刁书仁的《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叙述的则是1467（明成化三年）及1479年（明成化十五年）明朝与朝鲜联军合击李满住、董山建州女真的事情。台湾陈捷先的《清太祖时期满洲与朝鲜关系考》运用大量史料考证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与朝鲜的种种交往。陈捷先的《略论天聪年间后金与朝鲜关系》和李治亭的《后金与李氏朝鲜战争述略》则阐述的是后金汗皇太极在位时期对朝鲜发动战争的情况。

尽管上述论文所研究的角度和领域各有侧重，并谈出了在明朝的不同时期建州女真与朝鲜王朝的各种复杂关系问题，但笔者认为，相对于建州女真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这些论文只局限于建州女真与朝鲜的个案研究，宏观研究不足，未能系统完整地体现出整个明代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史，因而不利于对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的整体认识。例如，对一些重要阶段、重要事件的研究尚存薄弱环节，或者说有空白之处。凡察及董山时期的建州女真与朝鲜交涉颇多，可是鲜见于相关论文。作为建州卫子卫的毛怜卫首领郎卜尔罕，最终是被朝鲜杀死，此应是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少有专题探讨。另外，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在研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包括高丽、李朝与女真的关系）时，是以中国史为主线，从中国对朝鲜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对女真同朝鲜关系的研究亦是如此，即总是站在把女真作为中国境内一个边疆民族跟随明政权开展与朝鲜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其与邻国朝鲜的交往。吉林省社科院孙与常的论文《李朝与建州女真的关系》，尽管把李朝放在前面，但还是从中国史的角度来探讨中朝关系，并没有着重强调明皇朝在其中的作用问题。实际上，朝鲜如何对待明天朝境内接壤朝鲜国土的一些边疆民族，这是朝鲜对外政策的一个内

容。特别是朝鲜与建州女真发展关系过程中，明朝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即朝鲜、明朝、建州女真三边关系是如何进行的 这是颇值得研究的课题 可是鲜有论文来对这三边政策作比较研究。笔者想到 如果在研究同一个问题时进行一下“换位思考”转换一下研究视角 即以朝鲜史为主线、从分析朝鲜外交政策的角度去分析其与中国皇朝及其边疆民族的关系，那就会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从而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可以得以更为明确的阐述。本论著正是在尽可能地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 欲分析、论证三者的关系 避免孤立地剖析朝鲜与建州女真的关系。

本论著是从朝鲜史的角度 以朝鲜历史的发展为线索 来分析朝鲜的外交政策的。具体地说，是通过对朝鲜王朝同明朝北方边疆民族建州女真关系的研究 来揭示朝中关系某些深层次的内涵 从另一个侧面揭示朝中关系的某些特殊性质及普遍规律。建州女真毕竟是明朝辖区内的一个边疆民族 那么朝鲜如何对待女真 必然要与其对明关系有所牵连。朝鲜与女真或发展友好关系或进行武力冲突，要考虑宗主国明廷的立场 看明皇朝的眼色行事 即明廷对朝鲜的支持或反对态度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朝鲜与建州女真关系发展的程度。这样一来，朝鲜与建州女真的关系 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朝鲜与女真“一边”的关系 而是涉及到了朝鲜与明朝、明朝与女真、朝鲜与女真这样的复杂的“三边”关系。例如 在李朝世宗统治时期 朝鲜国王一度曾授予建州部首领董山以官职并给予赏赐 这就引起了明朝方面的关注和不安 为此明帝专门派使前去斥责 令朝鲜国王矫枉改过。同样的例子还有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与明公开对峙后 朝中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朝鲜成为明与后金的均衡力量 而围绕着如何对待建州女真的问题 朝鲜与建州女真、朝鲜与明皇朝、明政权与建州女真之间 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本论著正是基于这种思考而展开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和阐述，而这亦为本书的特色所在。

值得说明的是 笔者在此称朝鲜王朝、建州女真、明皇朝为“三角关系”而没有称之为“三角外交关系”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从当时的

实际情况来看，李氏朝鲜在宗藩体制下与明皇朝维持着册封朝贡关系，其与明皇朝之间的往来可以称为外交关系；而建州女真及其后来建立的后金 在其取代明朝以前 是明朝境内的边疆民族政权 属一国内的关系 因此女真政权与明朝之间的各种交往 不可称之为外交关系。当然 从朝鲜方面而言 朝鲜王朝作为主权国家 拥有独立的外交权 其与明朝以及女真的往来，皆可称之为外交关系。但为了阐述上的方便起见 故笔者在叙述到朝鲜与建州女真政权以及明皇朝的交往关系时 采用了“三角关系”这个名称。

国外有关朝鲜王朝与明代建州女真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学者的研究为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社会科学院编的《朝鲜全史》（第三卷）韩国全海宗的《韩中关系史研究》、李龙范的《古代的满洲关系》、李丙焄的《韩国史》、李基白的《韩国史新论》、金庠基的《东方文化交流史论考》等著作 在探讨韩中关系史时曾提及明代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相关论文，例如朝鲜李淳信的《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朝鲜与女真关系述略》 韩国方面主要有全海宗的《朝鲜前期韩中关系的几个特征问题》，曹永禄的《入关前明·鲜时代的满州女直史》 徐炳国的《朝鲜前期对女真关系史》 金九镇的《朝鲜前期韩中关系史试论》，金锡禧的《关于世宗朝徙民的考察》（Ⅰ、Ⅱ）李炫熙的《朝鲜前期对来朝野人的政策》等文章 他们不只是探讨朝鲜与建州女真的关系 还包括了朝鲜与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的关系内容。这些论文大体体现出了韩国学界目前的研究水平。

应当承认 朝鲜和韩国学者研究朝鲜同女真的关系问题时 在史料的挖掘和利用方面 有他们自己的特点和长处 有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许多相关史料，虽中国书籍中没有记载，却可以在朝鲜（韩国）史书籍中找到。例如 全海宗在其《韩中关系史研究》中 就提供了有关“丁卯胡乱”的很多详细情况。但是，上述朝鲜及韩国学者的研究，或者出于民族主义史观 或者由于缺乏充分的论据 或者由于方法论上的问题，大多站在本国的立场上，从自我中心论出发来叙述当时历史，对诸多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大的片面性 令人难以信服 甚至有些观点是

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颇值得商榷。例如 有的学者将中国女真族看成是朝鲜半岛的“外来户”、“入侵者”对女真人抱有民族歧视态度 而对朝鲜政府的“北进政策”大加赞赏 将朝鲜迫害、驱逐女真人看作是“恢复”高句丽时期固有的领土。朝鲜学者李淳信在其《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朝鲜与女真关系述略》一文中就持有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实情的。因为朝鲜半岛东北部、西北部地区 很早以来就是中国女真族世代居住的地方，史学工作者应尊重当时的事实。另外韩国论著中还存在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需要进一步解决和澄清。例如 对建州左卫设置时间上的看法 对是否是李满住建州女真寇犯朝鲜等问题 韩国学者曹永禄在其文章《入关前明·鲜时代的满州女直史》中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 但经过结合史料和实际情况辨析 笔者认为该文的提法值得商榷。

日本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三田村泰助的《清朝前史的研究》、河内良弘的《明代女真史研究》、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等著述论及明代女真的社会经济发展 尤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内容较为具体 但这些著作大多是记述满清发展历程的历史 重在对女真族的社会组织、阶级结构等展开阐述 而对此时期朝鲜与建州女真关系的具体发展过程却很少论述。

总之 以往的研究为笔者提供了继续研究的前提 但国内外史学界在对有关朝鲜王朝与明朝边疆民族建州女真的研究方面，确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 有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补充完善的地方 这为笔者明确了今后研究的起点。本论著既以写史的方式纵向阐述朝鲜与明朝建州女真关系的发展历程，又用专题探讨的形式进行横向论证，史论结合 对比研究 同时对国内外史学界相关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和空白之处予以补正。由于迄今为止史学界尚未见到专门研究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整体关系史的著作，而正好为填补学术领域这一空白提供了可能。其中值得关注的是 通过对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关系的研究 阐明建州女真在朝鲜半岛东北地区势力的消长所产生的影响，这对揭示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

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范畴为十五世纪初期至十七世纪前半期，朝鲜王朝前期与建州女真发展关系的一些史实。为了研究上的方便，笔者限定研究的范围为自1403年（明永乐元年）明成祖永乐皇帝任命女真酋长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设立建州卫始到1636年皇太极将女真族名改为满洲止，对这二百余年的时间内，有关朝鲜与建州女真外交往来、经济贸易等问题的探讨。大多数文章在写女真历史时只是写到后金建国前而笔者认为后金政权是建州女真历史发展的延续到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止建州女真这个族名才算正式停止使用因此笔者把朝鲜与建州女真的关系一直介绍到1636年。尽管时间跨度为两个世纪但由于其中建州女真有近一个世纪的沉寂期，因而本课题所论述的内容，主要以十五世纪初期到六七十年代，以及十六世纪末期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这两个时间段内朝鲜与建州女真的关系。

在第一个时间段内即十五世纪朝鲜正值太宗、世宗、世祖国王在位第二个阶段即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前半期朝鲜的当朝国王分别为宣祖、光海君、仁祖。本课题正是以朝鲜王朝的这几任国王为主线，对他们在位时期与同时代的建州女真代表人物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矛盾冲突关系展开专题性的探讨和论述。例如朝鲜太宗王与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毛怜卫首领把儿逊的关系世宗王与凡察、董山建州部的关系世祖王与毛怜卫首领郎卜尔罕、建州卫女真领袖李满住的关系。宣祖朝，朝鲜与建立后金政权前的努尔哈赤女真有过诸多交涉；光海君时期朝鲜与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周旋仁祖王在位期间朝鲜先后两次被皇太极后金政权所征服。

本论著欲在充分利用丰富的中国史料及朝鲜史料的基础上，注重吸收、参考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法、考证辨析法、逻辑推理法等手段以纵的、横的以及交叉的多视角研究方法本着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对朝鲜与中国明皇朝内重要边疆民族建州女真的外交往来、经济贸易等问题进行系统、全面地研究以展现其双边关系的来龙去脉、本来面貌以及本质和特点。并

且对一些所谓敏感的问题 结合历史事实进行大胆的理论探索 对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挖掘论证 提出自己的见解 阐明问题的本质 从而开拓更为广泛的研究思路。从这一点上来说, 尽管本课题与以前学者们的研究内容有重复 有整理性的成分 但本课题又有别于其它研究成果。

具体说来 本课题研究采取比较的方法 主要是指比较朝鲜王朝与明皇朝对女真所采取两手政策的目的、表现形式、具体措施的同异及其效果等。朝鲜出于怀柔女真的目的, 对女真首领经济利诱和授予官职; 当女真的发展危及到朝鲜利益时, 朝鲜即配合明皇朝进行军事征讨。明朝在对待朝鲜和女真发展关系的问题上, 一方面明确反对二者私下交通 不容忍朝鲜授予女真首领以官职 另一方面当朝鲜与女真出现冲突时 明朝又偏袒朝鲜 压制女真的复仇行为。

所谓比较研究方法 还包括朝鲜王朝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对女真所采取不同对策的相互比较。例如, 十五世纪时期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前半期朝鲜对建州女真的政策有明显的不同。十五世纪太宗、世宗、世祖期间 朝鲜奉行的“事大交邻”政策的内容中, “事大”是指事明朝, “交邻”是指交女真 因为此时明皇朝强大 而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 随着明朝的衰落 光海君、仁祖时期的朝鲜“事大”对象发生了变化 在后金军事威压之下, 朝鲜不得不屈事于后金政权。

所谓“历史地看问题”指不能用现在的国际关系准则去看待历史上的朝中关系 不能用现在的民族关系去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不能用现在的领土问题看待历史上的领土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问题是历史的真实 即历史上的客观存在 对此我们要正确把握。例如 在朝鲜太宗时期 为了争夺图们江地区十部女真人的领土问题 朝鲜王朝与明皇朝多次交涉 最终如愿以偿。在今天看来 彼时朝鲜与明的这种争夺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今人不能过多地去评论朝鲜太宗的是非 因为就当时朝鲜的角度而言, 太宗王是尽可能地朝鲜争取更多的利益。

所谓“历史地看问题”还涉及到如何正确地理解当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民族分化和融合

逐步形成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以及周边其他古代国家之间也有相对独立、割据乃至混战的时期。如何具体阐明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分析朝鲜王朝、建州女真、明皇朝三者关系的关键所在。

所谓“史论结合”应是“论从史发”,即理论需以事实为根据,认识必须以存在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之中。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都强调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本课题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尽可能地使用原始资料,列举了许多的历史事实,以求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在分析研究史料的基础上,阐明问题的内在本质。例如,课题中有关于朝鲜太宗王、世宗王极力阻挠和挽留建州女真人留驻朝鲜的许多史实,表面上看涉及到女真人的去留问题,但实质上这是朝鲜国王与明朝政府争夺女真统治权乃至领土所有权的斗争,是有深层次内涵的,为此文章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辨析说明。

本论著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第一章,朝鲜王朝与明代建州女真交往的历史渊源。第一部分介绍的是高丽与辽宋金时期的女真族之间的交往情况,其中既有经济贸易,又有武装冲突。第二部分是元朝末期高丽与朝鲜半岛北部女真之间关系的内容,表现为高丽为实施北扩政策,积极招抚女真部落,逐步缩小女真人在朝鲜半岛的居住区。第三部分阐述的则是高丽与明初的女真关系,高丽乘明初统治不稳定无暇顾及东北女真地区之机,利用朱元璋政权的“天朝大国”心理,一步步地与明朝争夺地盘,扩大高丽在女真人中的影响,吸引女真人归附高丽。

第二章,朝鲜国王太宗至世祖时期,朝鲜王朝与明皇朝对建州女真的争夺。时间为十五世纪。本章主要以朝鲜太宗王、世宗王、世祖王为主,介绍了他们在位时期对建州女真的政策。具体内容为,第一部分中,为了推行北拓疆土的计划,朝鲜太宗极力与明永乐帝争夺对图们江流域女真的统治权,设法阻挠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附明廷,武力打击归附大明的毛怜卫首领把儿逊。第二部分内容介绍的是朝鲜世宗

王时期对女真的安抚与征伐，包括笼络回迁朝鲜境内阿木河地面的猛哥帖木儿部，挽留凡察、董山建州女真部居于朝鲜，两次侵入以李满住为首的建州卫。第三部分内容是关于世祖王对建州女真的打击与优惠政策，包括杀害不服从朝鲜约束的毛怜卫首领郎卜尔罕，与董山建州女真的私下交往，以及与明朝联军袭击李满住建州卫等内容。第四部分，对十五世纪太宗、世宗、世祖时期，有关朝鲜王朝对建州女真的两手政策，建州女真对朝鲜政策的双重性，建州女真对明皇朝与朝鲜王朝的“二元朝贡”体制，以及明朝政府在处理朝鲜与建州女真交往问题上的两面性等作了阐述分析。

第三章 宣祖至仁祖时期的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的关系 时间为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前半期。自十五世纪末期董山、李满住等被杀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建州女真一直处于衰落期，因而朝鲜与建州女真之间没有突出的事件发生。十六世纪末，随着女真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的崛起，朝鲜与建州女真的关系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第一部分内容是朝鲜宣祖王朝与建立后金政权之前的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关系述论，主要围绕三个事件而展开，即关于努尔哈赤“援朝御倭”的提议，围绕女真越境采参问题，针对努尔哈赤“请京受职”事件，朝鲜与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种种斡旋活动。本章第二部分为朝鲜光海君王朝、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明皇朝三角关系出现的雏形时期，包括的内容有：明朝请朝鲜助兵，朝鲜出兵助明抗金，战后朝鲜、后金及明朝对朝鲜降将的不同态度，以及因明朝毛文龙驻军而引发的后金与朝鲜的矛盾。本章第三部分阐述的是仁祖时期朝鲜王朝与皇太极后金政权的武装冲突及此后的朝鲜、后金、明朝三角关系，包括1627年“丁卯之役”的发生，战后朝鲜与后金之间关系的不睦，以致“丙子之乱”的出现，从而引发了宗藩对象的改变，朝中传统政治秩序的转变。第四部分是对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前半期宣祖、光海君、祖统治时期，有关朝鲜与皇太极后金、明朝的三角关系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朝中传统政治秩序作了理论上的思考。

第四章，是有关朝鲜王朝前期与建州女真的经济贸易交流情况。

经济贸易主要包括贡赐贸易的发展以及边境贸易的开展。本文分别分为朝鲜与建州女真初期和朝鲜与建州女真后金政权这两个时期，来介绍他们之间开展贡赐贸易和边境互市的情况；还分别分析了经济贸易给朝鲜所带来的利弊影响，以及贸易经济对建州女真发展所起到的显著作用。关于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利用地缘优势开展贡赐及边境贸易的状况 以及贸易对双方所产生的正负面影响 栾凡在其专著《一种文化边缘地带的特有经济类型剖析——明代女真族的多元经济研究》中，曾对包括建州女真在内的女真族与朝鲜的经济贸易关系有所涉及，但内容比较分散。本论文拟在此拿出专节内容，对朝鲜与建州女真开展贡赐及边境互市贸易的背景、贸易的过程及带来的效应 进行相对集中的阐述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双方文化交流的内容（其中主要是先进的朝鲜文化影响相对落后的女真文化），亦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但是 由于史料的匮乏和分散 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 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在本论著中亦未能加以专题性探讨 唯俟日后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对朝鲜与女真的文化交流这一学术界鲜有人涉及的加以补正，以填补国内学术界有关研究的空白内容。

第一章 朝鲜王朝与明代建州女真关系的历史渊源

本论著所要研究的是朝鲜半岛上的李氏王朝在北拓疆土过程中，与中国边疆部族建州女真关系的情况，但任何事情都是有其渊源相承的，李朝与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在它们之前，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政权与辽金宋元时期的女真族就有了诸多交往，因而本论著中设立专节，首先对朝鲜李朝与明代建州女真建立交往关系以前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

一、高丽与辽宋金时期女真的交往

公元十世纪，东北亚地区战乱频仍，在朝鲜与中国都发生了政权更迭。朝鲜半岛上，统一新罗末期，军阀割据混战不已，后百济、泰封国、新罗三国鼎立。公元918年，泰封国大将王建所部举行宫廷政变，拥立王建为王，建立了高丽王朝，由他再次统一后三国。中国大陆上，大唐帝国土崩瓦解，中原一带和长江流域相继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在中国东北，生活在辽水上游潢水流域的边疆民族契丹却乘机兴起，916年，耶律阿保机自立为皇帝，建立了契丹（辽）民族政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北宋政权，辽宋遂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由于朝中很早就有相互交往的传统，因而高丽分别与辽、北宋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辽、北宋并存后期，中国东北的又一个重要边疆民族，生活在按出虎水（即今黑龙江省阿什河）的女真族，在其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于公元1115年建立了大金政权。由于女真

族生活的部分地区与高丽国境相连，因而女真人因地利之便与高丽开展边境贸易 互换商品 但同时双方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摩擦。

在此 笔者分别介绍一下高丽与辽朝时期的女真关系 以及高丽与女真政权金朝的交往情况。

（一）高丽与辽朝女真的贸易往来和武装冲突

女真是蒙古人种通古斯族的一系。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11月，后金汗皇太极将其所属女真族名正式命名为“满洲”，这标志着满族共同体最后形成，从此满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 满族一女真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肃慎族 即女真族是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族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白山黑水之间美丽富饶的广阔地域，是这些古老民族和满族生息繁衍的摇篮。

女真的最早先人 学术界一般均认为是夏、商、周时期的肃慎。例如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二七记有：“女真盖古肃慎氏，……”洪皓的《松漠纪闻》称：“女真即古肃慎国也。……”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亦载：“女真古肃慎国也。……”。肃慎 也写作息慎、稷慎，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传说的尧、舜时代 肃慎人就与中原人民建立了政治联系。舜时北方朝贡的有“山戎、北发、息慎”^① 息慎即肃慎。周朝统治者称“肃慎、燕、亳 吾北土也”^② 由此说明肃慎曾从属于中原王朝周朝。

肃慎人很早就居住在长白山以北、牡丹江中下游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山海经·海外西经》谓：“肃慎之国在白民 秽貊 东 有树名雄常 先人代帝于此取之。”又《山海经·大荒北经》亦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 有山名曰不咸 今长白山 有肃慎氏之国”。^③ 肃慎的地域 大致包括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以及朝鲜半岛东北

《史记》卷1 五帝本纪。

《左传》召公九年。

转引张博泉著：《女真新论》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研究系列之十九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21页。

地区 向北可达黑龙江下游一带。

漫长的历史岁月，肃慎人又经历了各个发展阶段。东汉、三国时，肃慎被称为挹娄，《三国志》单独为“挹娄”立传记载：“挹娄 自汉兴以来 臣属夫余……”；《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挹娄》记有：“挹娄 古肃慎之国也”；《晋书·肃慎氏传》则有更进一步的记载：“肃慎氏，一名挹娄 在不咸山（今长白山）北 去夫余可六十日行 东濒大海 即鄂霍茨克海及日本海）西接寇漫汗（一封建属国）北极弱水（黑龙江中下游）”。这说明汉代的挹娄是肃慎之国 即“由肃慎改称而来”。

北魏时 挹娄族南下 同当地民族融合而为“勿吉”，《魏书·勿吉传》谓：“勿吉国……旧肃慎国也”。

北齐时 勿吉又转读音为“靺鞨”。《北齐书》卷七载：“河清二年（563年）是岁 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隋书·靺鞨传》记载靺鞨有七部：“粟末、伯咄、拂涅、安车骨、号室、黑水、白山”。《旧唐书》载：“靺鞨 盖肃慎之地”。《新唐书》更明确认为：“黑水靺鞨居肃慎地 亦曰挹娄 元魏时曰勿吉”。唐代 靺鞨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 分为七个种姓的七个部族。七部之中 以松花江、牡丹江一带的粟末部和黑龙江中、下游（包括库页岛）的黑水部实力最强。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派遣郎将崔忻前去粟末地区设置忽汗州 册封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① 这便是有名的“渤海国”，它以粟末靺鞨人为主 包括一部分高句丽入。渤海管辖着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绥芬河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今苏联滨海一带的大部分地域 分为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其中南海府与朝鲜半岛的新罗政权“以泥河 今朝鲜咸镜南道之龙兴江 为境”^② 而渤海与女真属同系 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女直（女真）渤海本同一家”^③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这句话，可为佐证。

①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②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金史》卷一，世纪。

黑水靺鞨是女真的主要来源 位于肃慎故地。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七称黑水靺鞨“世居混同江（即松花江东北流段及黑龙江自同江县以下入海段）之东，长白山、鸭绿水之北。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726年（唐开元十四年）唐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立了黑水都督府，赐都督倪属利稽姓李名献诚，并授之为“云麾将军”，兼领黑水经略。

契丹兴起建辽后，926年（辽太祖天显元年）灭亡渤海国，并在其故地立东丹国。渤海旧地大都被南下的黑水靺鞨所占，黑水靺鞨取代渤海而兴，改称女真，这样在中国史书上靺鞨名称正式为女真所取代。不过早在唐朝末期，女真之名已见于史载。《辽史》卷一载：“唐天复三年（903年）春，伐女真，下之，获其户三百”；又载：“唐天佑三年（906年）十一月，遣偏师讨……东北女真之未附者，悉破降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女真族与靺鞨同源而不同流，女真是以靺鞨中的黑水靺鞨为主统一女真各部族而形成的统一的女真民族。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七记载：“唐贞观中，靺鞨来朝，太宗闻其风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国始闻其名，……”。这表明靺鞨和女真是两支。

辽朝时期，女真分为徙居于辽阳以南地区被辽收入编户的熟女真，以及在北部故地不隶辽籍的生女真。《金史》记载：“其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①其中居住在今朝鲜半岛的女真主要有三部：一是蒲卢毛朵部，即渤海时期南海府故地的居民，分布于今朝鲜东北部咸镜南道地区；二是长白山三十部，分布于今狼林山以东、朝鲜两江道及咸镜南、北道的山地一带。二者皆属生女真，都地处朝鲜半岛东北部，故高丽称之为东北女真或东蕃。三是散居在朝鲜半岛西北部鸭绿江东西两岸今朝鲜平安北道、慈江道地区的女真人，中国方面称为鸭绿江女直或渤海女直（属熟女真），高丽则称为西北女真或西蕃。女真族的分布区皆为辽朝的疆域，辽朝先后设置“鸭绿江

女真大王府”、长白山女真国大王府”、蒲卢毛朵部大王府”等进行管辖，图们江流域以及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皆受辽朝东京招讨司和统军司的管制。女真首领接受辽朝授予的官职，定期向辽朝贡。如《辽史》记载 940 年“，鸭绿江女真遣使来觐”^②；1012 年“，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 乞授爵秩”。^③

朝鲜半岛上 高丽太祖王建以高句丽 继承者自居 在其建国之初 坚定不移地奉行恢复高句丽故土 即向北拓展领土的扩张政策 而所扩张之领土，正是作为我国跨境民族——女真族的聚居区。女真人的存在 不仅对高丽边境安全带来威胁 而且对高丽顺利实施北进政策是极大的障碍，故太祖王建及其后继者对原先隶属于渤海的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人 采取所谓的“恩威并施”方针 即对倾向高丽者采取怀柔之策予以招抚 对背叛和犯边者采取强硬政策 进行武力征讨 从而加快了北进拓境的步伐。对东北面女真扩张方面，高丽太祖王建是派遣大将庾黔弼率兵前去招抚 于是“(女真)诸部相率来附者千五百人 由是北方晏然”^⑤。

在对半岛西北面女真人散居地的扩张过程中，高丽曾遭到女真的顽强抵抗 史载“(高丽成宗)命刑官御事李谦宜城鸭绿江岸以为关城 女真以兵遏之 虜谦宜而去 军溃不克城 还者三之一”^⑥。由于高丽的扩张政策与辽朝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于是 992 年（辽圣宗统和十

《辽史》卷 46 百官志二。

《辽史》卷 4 太宗纪下 会同三年。

《辽史》卷 15 圣宗纪六 开泰元年正月癸未。

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它起初建都于今辽宁桓仁地区 公元 3 年移都于今吉林集安 427 年又迁都平壤。关于高句丽的归属问题 是目前史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中国和朝鲜韩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中国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只不过后来扩张到朝鲜半岛；朝鲜韩国学者则认为高句丽属于朝鲜历史的一部分。此处王建以高句丽继承者自居，自然是站在高句丽为朝鲜半岛故国的立场上，从而进行一系列领土扩张的。

⑤ 《高丽史》卷 92，庾黔弼传。

⑥ 《高丽史》卷 3，成宗三年条。